

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

周武 陈先春

从 1914 到 1918 年整个欧洲呻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和恐怖之中，几乎所有的西方殖民列强都毫无例外地卷入了这场长达 4 年之久的战争泥淖。这种态势决定了它们“无暇东顾”，至少是限制了它们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利益的膨胀。而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劫难及其所造成的国际格局却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提供了在中国拓展自身利益的绝佳机遇。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幸灾乐祸之余，正是利用这一百年不遇的机会形成了新的对华战略，企图把独霸中国的狂想变成现实。虽然这种企图最终没有成为现实，但日本在华利益及其势力却空前地扩展了，成为近代以来日本侵华史上的一个突出的环节。

一、“天佑良机”与大隈对华政策

独霸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既定国策，也是日本企图建立以它为中心的区域霸权并进而确立世界霸权的重要步骤。早在明治政府始建之初所炮制的“大陆政策”（后来称为“明治遗策”）里，就明确地提出以武力征服朝鲜并以朝鲜为“渡满（中国东三省）的桥梁”对中国进行武力渗透的扩张战略及其具体步骤：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满蒙地区；第四期以满蒙地区为基地，征服全中国；第五期以中国富饶的物产资源为后盾，征服南洋、亚洲乃至全世界，建立一个日本主宰的“八紘一宇。的。大日本帝国”。然而，帝国主义是按实力瓜分世界的。与欧美老牌的列强相比，后起的日本无论是经济、军事实力还是综合国力都相去甚远。所以，在波谲云诡、纵横捭阖的东方紧张的国际格局中，日本想插足并进而排挤欧美列强在华势力，实现“明治遗策”，实际上不过是军国主义者一厢情愿的狂想。狂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引起国内社会舆论的极度关注，1914 年 7 月号的《中央公论》在社论中就曾对日本在国际资本竞争中的节节失败表示了愤懑和忧虑：“往年，帝国（即日本）乘百战百胜之威将

势力范围扩及满洲，欧美各国颇有羡慕之色，而今在资本战争中，帝国却不得不输于各国。斥责外交之无能，对当局加以鞭策，固无不可。然贫困之日本此时不能在中国大力扩张利权，乃天数所使然，只能隐忍暂时，等待再度发展之机，切不可徒事焦虑慌张而招致各国之耻笑。”经济上既无力与欧美列强竞争，那么“再度发展之机”又在哪里呢？对于亟欲在中国大力扩张利权的日本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无奈。诚然，欧美列强出于维护与扩张在华既得利益的需要，有可能牺牲局部利益拉笼和纵容日本于一时，这无疑给日本在中国的渗透以有利的时机，但一旦危及它们在中国的根本利益，欧美列强决不会听之任之。也就是说，欧美列强在华取得的巨大利益一方面在局部利益上有可能纵容日本，另一方面又在根本利益上制约日本的扩张企图。在这种国际竞争的夹缝中，日本对华政策总体上受制于那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及欧洲列强各自的战略态势，与“明治遗策”所包孕的不可告人的祸心相比，日本的对华战略处于一种被钳制的状态。

在这种被钳制的状态中。日本既无法与老牌的列强正面抗衡达到目的，就只有期待列强之间的激烈冲突，并利用这种冲突所造成的“真空”缝隙来伸展自己的势力。日本苦苦等待的“再度发展之机”终于到来了。1914年夏，以德奥意同盟国为一方以英法俄协约国为另一方，两个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以萨拉也夫(萨拉热窝)事件为导火索在欧洲大打出手，在华拥有巨大利益的英、法、俄、德欧洲列强几乎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投入这场规模空前的争夺世界霸权的大战，泥足深陷于欧洲的内部事务中。这场大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但它深刻地改组了东方的国际政治格局，欧洲列强被愈演愈烈的战事缚往了手足，原先仰人鼻息的日本朝野上下却幸灾乐祸、欢欣鼓舞，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扩张欲望再也抑制不住地奔泻而出，狂呼：这是“发展日本国运的大正新时代的天佑”，是“百年不易得的天佑良机”，竭力主张利用这个“天佑良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权利”。在今日之局势中创造亚细亚之未来和对华政策之基础”。尚未到任的日本驻华大使日置益毫不掩饰地说：“怕他战不成，战则大妙”，冀幸之情溢于言表。日本政府以英日同盟为由，宣称要“履行”同盟的义务，采取必要的措置。日本驻华代办小幡西西对外交总长孙宝琦说：“自此次欧洲开战，本国政府虽有维持和平之意，而一般国民血气甚旺，颇有蠢动之意，故万一生出误会，政府迫于不得已，难保不为必要之措置。”首相大隈重信则更明确地说：“德虽与日不表敌意，青

岛舰队难免与英法冲突，日以英日同盟关系，如东方有战，日本不能独立，总须东方德舰灭尽，海面方告和平。”英国对日本的“维持和平”的“好意”虽然心怀惴惴，不无警戒，但因困于欧战，不得不在做出某种限制日本行动的范围后达成谅解。8月18日英国政府发表宣言：“英日两国政府互相商洽之后，认为已有采取英日同盟所预期之保护远东全般之行动之必要，并注意该协约(指《英日同盟协约》)所述中国之独立与完整。”但“日本之行动，除为保护日本在太平洋航线之必要，将不超出中国海而至太平洋，亦不至超过中国海以西之亚洲洋，除在东亚大陆上之德国领土之外，亦不得侵犯任何外国领土。”日本外相加藤高明一再表示：“此为永保东亚和平起见，并无占领土地野心”。这位素以英日同盟为“帝国外交核心”的外相承认：“今日本虽非处于根据同盟条约之义务而必须参战之立场”，但“一则基于同盟情谊之英国请求(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7月正式向日本要求援助)；二则为了帝国趁此时机从东洋清除德国之据点，以进一步提高国际地位之利益。由此两点，断然参战，相信乃适合时宜之良策。”对于日本来说，参战确实是一个“良策”，一方面可以顾全同盟情谊，另一方面又可以用“承担英日同盟的义务，保卫东亚和平。旗号，从德国手中夺取胶州湾，并进而对中国实行武力渗透。1914年8月8日，日本不顾中国政府此前宣布的“严守中立”政策，将军舰驶入青岛海面。8月15日正式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远东海上的德国军舰无条件、无代价地一律撤回，并将德国的“租借地”胶州湾无条件地交由日本接收，然后由日本“交还”中国。同时，公然警告中国政府不得与德国私相收援胶澳，小幡西西赴外交部而告孙宝琦：“关于胶澳问题，中国政府须先咨询英日两国同意，不宜自行处置，理应决定不与德国交涉此事，否则将生极重大之结果。”8月23日，日本的“最后通牒”没有得到德国的答复为由，对德复战。旋即出兵山东，占领莱州半岛。面对日本的节节进逼，中国政府一无所措，不得已划出所谓“特别区域供日军使用”。9月26日，日军4万人越过所谓“特别区域”，进占淮县车站。10月6日占领济南车站，控制了胶济铁路全线及其附近的矿产。11月7日攻占青岛，德军投降。日本一方面信誓旦旦地保证：“日本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或攫取更多领土的要求，也无意剥夺中国或其它国家人民现所占有的任何东西；”另一方面又轻而易举地从德国手里夺取了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及各种殖民权益，把山东作为战利品，驱逐青

岛海关人员，在被占领的各县设立民政署，架设军用电话。王芸生说：“胶州湾之德国租借地，已成为日本乘机独霸东亚之爆发点”。

日本之出兵山东，其意图不仅仅是接收德国在华的全部权益。就在日本正式对德宣战后的第4天，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加藤外相建议对华应提的要求：(一)将关东洲的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的期限，进一步延展为99年；(二)在日本的援助下，(中国)逐步改善南满及东蒙的军政及一般内政；(三)承认日本居民在这些地方的居住和营业的自由。在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后，日本又以“满蒙之特殊权益”要挟中国政府，“企图趁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之机，占领该地，以便为延长十余年内即将满期的旅大租借地保确其交换条件。”这些当然也不是日本所要达到的全部战略意图。但仅就这些要求而言，日本在“确保东亚和平”幌子背后所包藏的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和损人肥己的政治动机，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

然而，事情远未到此结束，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隈内阁外相加藤高明又训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日本长期“被钳制”的侵华欲望在特定的国际背景下的释放，是大隈对华政策的集中体现。关于《二十一条》的具体条款和交涉的全过程，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已有相当详尽的描述，不再赘论。值得指出的是，《二十一条》的出笼决不是什么偶发的事件，而有其相当长的历史渊源和特定的国际背景，是经历长期的酝酿而形成的。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南满权益”。1908年8月，日本在《对外方政策决定》中又突出强调了它在满洲的“特殊地位”。1911年10月日本再次确定对华政策时，就不仅要确立它在满洲的地位，而且更进一步要确立在“中国本部”的优势地位：1913年，日本外务省在《对华外交政策纲领》文稿中把这一对华战略进一步具体化。文稿中说：“关东洲(即辽东半岛)租借地是我国对满蒙方面利权的根底活动的重点，须以永久不动的决心处之”，南满洲铁路，是帝国在满洲进而在内蒙古利权的根本源流：……必须以永远把握的决心，……努力支持和发展我之地位”，“特别是华中及华南，人口稠密，物资丰富；因而列强竞争激烈，要谨慎周到地推进我之步伐，巩固地盘”，“福建和我台湾(1895年为日本占领)的关系，更不容他国觊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直在中国大陆活动的日本大陆浪人团体——黑龙会于1915年8—9月间提出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在这份秘密备忘录中，把

欧战视作日本侵华“百年不易得之大有为的机会”，要趁欧战方酣之际，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完全控制中国。从速解决中国问题，把中国变为日本的附庸。不惟如此，备忘录中所提出的听谓中日《国防协定私案》的主要内容与后来出现的《二十一条》几乎完全一致。由此可见，在《二十一条》出笼之前，《二十一条》的精神实质就已经具备，只不过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时空条件而没有外化而已。一战期间，由于英法俄的困于欧洲的内部事务，造成了东亚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先前一直处于被钳制状态之中的日本一跃而成为对华问题上最有力的发言者，英法俄等欧洲列强非但无力制裁日本，相反，为维护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皆有求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地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而此时的袁世凯政府正忙于帝制自为，对日本的步步进逼虽表示愤慨，但在“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的诱惑与外交恫吓及武力威胁下，于5月9日正式接受了《二十一条》。独占中国的立场出发，日本并不愿同欧美列强共有在华的代理人，因此在迫使袁世凯就范之后，大隈内阁又采取了所谓“多边倒袁”的政策：既暗中支持由清宗室遗臣所组成的“宗社党”，制造“满蒙独立”、分裂中国的罪恶计划，又加强对革命党人的援助，支持革命党“北上讨袁”，惟恐中国不乱，以便坐收渔人之利，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日本虽已隐约地看出袁世凯的政权并不稳固，加紧扶植亲日势力，但又与袁世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利用袁世凯这个尚有存在价值的工具解决“满蒙问题”，取得在华的最大限度的权益，确立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

出乎狂热的军国主义者预料的是，大隈内阁对华的强硬政策遇到了中国民众的强有力的抵制。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凡有血性者“莫不引为亡国大痛”，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抗议和抵制行动，或电告政府力拒日人要求，一或发布印刷物敬告全国父老，或定5月9日为国耻日，组织“国耻会”，或集会演说，合筹对日办法，或罢工罢市，甚至捣毁日本人的商店，或上书主战废约，一洗奇耻，……上海工商界组织了“中华国货维持会”、“劝用国货会”，吉林成立了“救国储金分会”，著名报人戈公振、黄砺生、周瘦鹃等人创办了《国货月报》，以“挽回外溢的利权，发达工商业”为宗旨，倡导国货，抵制日货，并派出国货调查员到全国各大城市调查民族工业生产销售情况，在《国货月报》上广为宣传。上海市场上“所谓销售日货之各店铺，皆已除

去商标，不为销售”，“向用日本器具之店号、茶馆，皆改接中国货”。东北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日本商店不得不关门停业。这场激荡全国声势浩大的反《二十一条》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扩张狂想，日本在华开设的企业、银行、商店首当其冲，如上海虹口一带日商所开的商店、蕃菜馆几乎“无人过问”了。在澎湃的排日浪潮席卷之下，日本对华的商品与资本输出大幅度下跌。1914年5月日本对华商品输出为1523万余元，到1915年9月迅速减至939万余元。日本报纸不得不承认“中国排日之声甚旺，且贸易上亦受莫大之影响”。因此，日本对华政策面临新的选择。

二、“西原借款。与寺内对华政策的转变

大隈内阁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动和强硬的对华政策，不仅理所当然地激发出中国的排日情绪，重创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扩张企图，在国际上亦引起了英美等列强的戒心与警觉。日本悍然提出的《二十一条》直接损及英、美等国在华的既得权益，于是，日本与欧美列强在对华问题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1915年春，美国曾几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袁世凯被迫接受《二十一条》后，美国国务卿立即训电驻中、日使节，声明中日之间凡有损害美国条约权利及旅华美国人民的权利，中国政治权、领土权及。在华的国际政策”（即。门户开放”）的条约，美国“概不能承认”。英、法等欧洲列强亦作出了类似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国际地位非但没有得到提高，反而陷入孤立的状态中。大隈内阁赤裸裸的对华政策在日本朝野上下也受到了普遍的怀疑，愤怒的指责，乃至猛烈的抨击。日本政友会领袖原敬率先在国会中对大隈内阁提出弹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一直批评大隈内阁对外政策的《东洋经济新报》在一篇社论中痛切地评论道：明火执仗的侵略政策和“国民的轻薄的举国一致论”，这二者将使日本“树敌于全世界，其结果只能说是为帝国贻下百年之祸根”。如果不改变日本传统的对华政策，把无垠的“望蜀之欲”文饰起来，将不利于日本对华的全面控制。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写道：今后日本对华。若还和过去几年一样，采取侵略的、恫吓的，强迫的态度，那么必然会招致中国政府和大多数人民的仇视和愤慨，妨碍日本在华发展经济事业。”元老山县有朋则批评大隈外交“缺乏远见”，“为

国家前途计实不胜忧虑”。外务省官员林权助和朝鲜总督寺内正毅议及大隈对华政府时，也谴责了他的不明智，认为大隈对华政策“将使日本陷于进退维谷之境”。事实上，大隈内阁所奉行的对华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功效，更没有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实质性地拓展日本的在华利益。对于日本来说，传统的炫耀武力的政策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在日本朝野内外一致集矢于大隈对华政策的同一过程里，一种新的以经济方式对华扩张的政策便应运而生。小田切认为，中国的商品市场前途非常远大，日本的过剩人口可以在辽阔的中国领土上得到生息，因此“必须把实业利益置于对华方针的首要地位”。西原也指出，目前中日关系的当务之急是“首先打下一个经济基础”。为此，他相继草拟了《在目前时局下的对华经济措施纲领》、《改进对华外交、加强日中经济提携草稿》等意见书，他认为，对华战略至关紧要的是“融合日中两国经济浑为一体”，具体说来，就是使日本“原料均可仰给于中国，制成品则以中国为市场”，实现日本的“自给自足”。1916年10月，大隈内阁垮台，由日本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取而代之。寺内鉴于大隈内阁对华的失策和自己在朝鲜总督任期内以“经济合作”等怀柔手段获得统治朝鲜的若干经验，一反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高唱中日“亲善合作”。寺内首相以大隈政策的激进批评者登上日本政治舞台后的第3天，即1916年11月21日，内相后藤新平便提出，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的姿态，建立一个足以与“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及美国经济相颉颃的“东亚经济同盟”。寺内组阁的成功及“东亚经济同盟”-战略构思的形成，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已由以武力渗透为主向以经济渗透为主的新政策转变。就其实质而言，日本对华政策的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其侵略本性的改变，也不意味着寺内对华政策真正有益于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更不意味着寺内对日本在华拓展殖民权益企图的放弃，恰恰相反，寺内对华政策更富有侵略性，是在新的形势下利用资本输出而使日本真正获益的政策。但与大隈以武力渗透为主的对华政策相比，寺内以资本输出经济渗透为主的对华政策既适应了日本垄断资本家扩展对华投资的愿望和要求，又获得了一种比较隐蔽的外观。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开始“布国威于海外”，政治、军事及综合国力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但总的来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增长的速度相当缓慢。直到1913

年，日本仍然是一个有 1767 百万日元的债务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入超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对外经济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转机。不仅扭转了自明治 29 年以来对外贸易入超的趋势，而且有了巨额的盈余。光是对外贸易盈余和航运业的收入两项就达 28 亿日元以上。日本不仅清偿了全部的外债，而且还借给英、法、俄等国 2770 百万日元的贷款，从债务国一跃而为债权国，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之列。政治经济是对外政策的基础，对外政策则是内政的延续。日本垄断资本的迅速膨胀，既是推动日本对华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又是寺内推行资本输出经济渗透为主的对华政策的现实基础。基于此，日本舆论界积极主张对华外交应“树立二大新政策。：一是外交以日元为中心，一是发展在华经济。应当说，寺内对华政策与这种流行的时调并无二致，。日元外交”正是寺内资本输出经济渗透的代名词。这一以资本输出为主体的“日元外交”在当时称作“菊分根”政策。“菊分根”一词，最早由寺内内阁藏相胜田主计提出，他把日本对中国的投资比作菊之分根，并著有《菊之分根》一书，因此它不过是寺内对华政策的一种形象说法。“菊分根”政策以“日中经济提携”相标榜，因而带有较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所谓用“经济之政策，极待机宜，中外亲善，方始告成，……日本对外野心，中外疑惑，亦得到洗刷净尽也”。

“菊分根”政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垄断资本膨胀的结果，也是寺内对华政策的核心。寺内对华输出资本的具体形式或主要形式就是对华进行大规模的贷款，其中有政治的，有军事的，有经济的，有公开的，有秘密的……。由首相寺内正毅、藏相胜田主计和西原龟三组成的“三人组”。操纵了对华贷款的资金，因其主要推行者为西原龟三，故又称这一时期的借款为“西原借款”。从 1917 到 1918 年间，寺内统治时期与段祺瑞政府签订的贷款合同见之报端有案可稽者凡 34 项，总计达二亿四千多万日元。其中西原经手的有 8 项，未成立的有 2 项，金额(除未成立者)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1917 年 8 月，段祺瑞政府特设“中日合办华汇业银行，以陆宗輿为总裁，作为经营借款的机关。借款，利用外资如用于发展民族工商业，推进近代化事业，当然是必要的，并无可非议。但在近代中国，借款则意味着国家主权的进一步丧失，西原借款当然也不例外。通过“借款”给中国，日本攫取了中国的许多利权，如满蒙铁路的修筑权，技术人员的聘用权，材料优先购买权，军队的训练权等等。而更严重的后果是：(一)段祺

瑞大量聘用日本的“顾问”、“教官”，引狼入室，输入了大批间谍、特务和军国主义者，强化了日本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操纵和控制，“此不仅贻国家将来不测之忧，且使独立主权生重大危险。”(二)日本借款给中国当然并不是希望中国强大，接洽中口军事协定以及军械借款的主要角色田中义一对英国外交官员坦白承认：日本需要一个脆弱的中国。从这个原则出发，日本一方面尽量拉拢段祺瑞，另一方面又默许日本军火商松冈等向南方军队出售武器弹药，有意识地在中国制造动乱。(三)日本通过“军械借款”和“参战借款”，不仅取得训练和装备所谓“参战军”(三师四旅)的权利，借机扶植亲日势力，而且怂恿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从而达到既控制中国军队又制造军阀混战以便更好地从中渔利这样一箭双雕的侵略目的。由此可见，寺内所谓“借对华秘密借款问题，以变更对华政策。其目的无非是最大限度地拓展日本在华的权益及其势力，而所谓“中日亲善合作”、日中经济提携”也不过是一种美丽的谎言!

必须指出的是，寺内内阁推行的“菊分根。政策还包含着更为深层的目的和动机。如。西原龟三的最初目的是，利用日本贷款来改变中国币制，确立日华货币混合使用的体制，扶植日本在华的经济。”1917年3月，西原发表了以《中国关税问题与日本》为题的论文，明确提出了以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为目标的日华经济共同体的设想。11月又发表了《东洋持久和平策入把日华经济共同体的设想进一步发展为“东洋自给圈”战略构想。这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把北到西伯利亚、南达印度以至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联成一体的“宏伟构想”，他说，对中国要排除“侵略性的压迫”，通过“王道亲善”“使四亿民众与我同化”。其具体方案是：(一)全部铁路由中国自营，由日本供给资金；(二)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煤炭生产铁，确保日本炼钢所需要的铁；(三)把“庚子赔款”归还中国，利用这项资金发展棉花、羊毛和石油业。这个庞大的构想可以说是日本1941年所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型。西原的这些设想在那时的时空条件下当然不可能实现，但利用大规模的贷款，扩大对华的资本输出，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进而独占东亚及东南亚的战略意图却是清晰、明确的。

“西原借款”不仅基于控制中国企业的需要，而且还以左右中国政治、攫取中国利权为目标，“先以稳妥条件提供贷款，在增进邦交亲善的同时，采取促其主动向我提供有利的权益的手段”。从而成为日本侵华的一个重要步骤。在“西

原借款”的实施过程中，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欧美列强的钳制，巩固、强化和拓展了日本在华拥有的权益，提高了日本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因而也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日本通过对华的大规模输出资本的经济渗透，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对此，寺内正毅首相志满意骄，他说：“大隈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寺内在短短两年的任期内为日本劫掠了“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的巨额利润和权益，从此“日本国际地位，日益向上，东亚盟主之位置，确固不拔。”当然有理由引为自豪，但对于中国来说，这却是一个悲剧的现实！在寺内志满意骄的背后是中国人的血和泪。

三、简短的结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日本侵华史上最疯狂的时期之一。日本凭藉欧洲列强困于欧战而无暇东顾的“天佑良机”，从中国掠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殖民权益，也在中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血污和灾难。从大隈以武力渗透为主的对华政策到寺内以资本输出经济渗透为主体的对华政策的有效实施，日本“已将最主要之东亚霸权收诸掌中”。在东亚的国际政治格局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不过，好景不长，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彻底失败和协约国的胜利而落幕。英、法、俄等欧洲列强再度重返中国，一个由帝国主义共同控制中国的格局重新恢复。战后初期，中国国内的亲日派失势，而巴黎和会上把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又激起中国各界人士的仇日情绪，中日关系陷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极为重视与英、美在外交政策上取得协调的原敬组阁后，即开始调整寺内的对华政策。日本军国主义者当然不会满足于这种局面，于是他们在对华问题上又开始等待和寻找新的突破点。